# 蔡元培小传

## 张殿兴　荆名取

蔡元培，字鹤卿，号子民，1868 年 1 月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父亲蔡光普，是当地某钱庄经理，为人宽厚，慷慨大度。6 岁时，父亲为蔡元培请了一位姓周的老师到家设塾授教，开始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11 岁时，蔡光普去世，蔡家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渐入困顿，使蔡元培无忧无虑的读书生活发生了某些改变。此时家中无力再聘家庭教师，蔡元培只能就近附读。两年之后，14 岁的蔡元培转入离家半里路的探花桥王懋修塾馆继续深造。在蔡元培求学的数年中，其母周氏付出了大量心血。她对蔡元培督责甚严，蔡元培深受其母的影响。对此，他后来忆述其母说：“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我母亲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的品性甚大。”经过多年刻苦攻读，1883 年蔡元培考中秀才，1889 年赴杭州参加乡试，中举人，受到主考官李文田的大力赞赏。蔡元培的中举在江浙一带士人中产生了一些震荡，人们竞相抄录传诵其“怪八股”。1890 年春，蔡元培继续在科举的道路上攀登，赴京参加会试，又中贡士。蔡元培返回故乡后，曾以贡士的身份应邀担任刚刚成立的上虞县志馆总纂一职。1893 年春，他再次赴京，补应殿试，得中为第二甲第 34 名进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 年升翰林院编修。至此，不满 28 岁的蔡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培已经达到了为当时读书人羡慕不已的科举道路之极。

正当年轻的蔡元培在科举的道路上一帆风顺的时候，清政府却由于西方列强的一再打击，正处于摇摇欲坠之中。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蔡元培幡然觉醒，摆脱仕途，走向革命。1898 年戊戌变法时，他成为维新运动的同情者。维新运动失败后，他毅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实际上放弃了京职，走上了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1898 年冬，蔡元培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即校长）。他到校后，聘任教职人员，修订学堂章程，整理校藏图书，并移寓学堂，主持校务，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和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此时均为该学堂低年级的学生。这是蔡元培教育救国思想的萌芽，也是他委身教育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同时，他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原富》等书，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态度也日趋激进。1900 年 10 月，蔡元培离开绍兴中西学堂，前往杭州筹办师范学校，虽几经奔波，终无结果，但由此结交了不少浙江学界人士。1901 年 9 月，经人介绍，他进入上海南洋公学担任特班十四总教习。1902 年 4 月，蔡元培与叶瀚、蒋智由、钟观光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他被推为事务长。该会最初以完善新教育、编订教科书为宗旨，其后，又曾计划设立学校教育部、社会教育部和实业部等机构。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高涨，该会表面办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这是 20 世纪初国内最早出现的革命团体，蔡元培的革命活动由此开始。不久，他又与蒋观云、林白水等人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校，蔡元培出任校长。随后该校就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

所。接着，蔡元培又创办了为接纳南洋公学学潮中被迫退学的学生的爱国学社，被推为学社总理。爱国学社成立后，在蔡元培等激进分子领导下，开展了许多革命宣传活动，在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

1903 年春，中国教育会与东京留日学界遥相呼应，在上海开展了拒法、拒俄运动，蔡元培不仅是领导人之一，而且还创办了《俄事警闻》，旨在通过反帝爱国的宣传，激发人们的反清革命意志。1904 年，他参加了暗杀团，并在上海亲自赁屋学习制造炸药。同年冬，他与浙江一带的革命党人一起，将暗杀团改组，创立光复会，并被推举为会长，使反清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1905 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蔡元培参加了同盟会，并任上海分会会长，在江浙地区发展了大批同盟会员，并在后来协调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方面起了积极作用。1906 年，蔡元培随孙宝琦到德国半工半读，入莱比锡大学进行学习，对西方美学、伦理学和教育制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进行了系统考察。留德期间，蔡元培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应商务印书馆之约，他先后撰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并翻译了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1907—1911 年留德四年的勤奋研读，使蔡元培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界一位学贯中西、熔冶中外新旧的大师。

武昌起义爆发后，蔡元培闻讯后，立即从德国回国。1912 年 1 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在他的领导下，临时政府教育部首先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末的旧学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为全社会送来一股民主共和的清新之风。他极力提倡社会教育，在教育部内设立社会教育司，

使社会教育第一次在教育行政上获得了独立的地位。针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积弊和革命后一些军政人员私德不修，缺乏民主共和思想素养，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进德会”，随后，又和宋教仁等发起组织“社会改良会”，旨在提倡为新的民主共和国社会树立新风。2月上旬，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献中，他提出了民国新的教育方针：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随后，蔡元培受孙中山之命，任迎袁专使，与宋教仁等人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蔡元培继续任教育总长。 9月，他再赴德国到莱比锡大学听课，并从事世界文明史的研究。1913 年 6月初，蔡元培回国参加“二次革命”，投身反袁斗争。革命失败后，他再次赴欧，去法国留学。留学期间，他与李石曾、汪精卫、吴稚晖等人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并与法国有关方面组织了“华法教育会”，任中国方面的会长，在巴黎开办华工学校，成立世界社，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1916年 6月，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蔡元培应教育总长范源濂之聘，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 年 1月 9 日，蔡元培走马上任，向全校学生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抱定宗旨，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其中，他突出强调：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应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元培一上任，立即针对北大的官僚腐败习气，从四个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

一是充实教员阵容，吸收进步学者。他一进北大，便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把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来办。随后，他又聘请了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新派学者来校任教，形成了一个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同时，他对理科和法科的教学力量也作了调整，解聘了那些不称职的教员，聘请了一些著名的学者来校讲学。

二是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泛吸收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允许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他在答复林琴南的信中说：“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适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悖于第一种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行，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三是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1917 年 12 月，他联合北京九所高校校长发起组织学术讲演会，以传布科学，引起研究兴趣为宗旨。1918 年，他又发起组织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自任会长。同时，他对北大师生组织的各种学会，总是给以热情的支持，并到会发表演说。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各种学会在北大校园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到 1919 年初，成立的各种团体有 20 余个，打破了过去沉闷和颓废的局面，学术讨论和思想争辩之风日益浓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是学制和体制改革。在学制改革方面，他首先扩充了文理两科，增设史学门和地质学门；法科准备独立，商科归并入法科；工科与北洋大学合并，预科改属本科。其次，他撤销文理科界限，将各科所属的专业一律改称为系，学长制也因之废除。接着，他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大学本科应学满 80 学分，必修、选修各占一半，选满即可毕业，不必拘泥于年限。体制改革方面，由过去的校长独揽大权改为民主办校，教授治校。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由校长担任议长，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和主任教员。各学科有教授会，规划各科的教学工作。

此外，他还实行男女平等，提倡平民教育。1917 年 12 月，他任男女兼收的北京孔德小学校长，1919 年 3 月，他在北京青年会上发表演讲，呼吁破除男女界限，尊重妇女人格；同月，他在天津青年会的演说中，进一步提出了男女同校的主张。他说：“言女子教育，则高等学校既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特设，视各国战前之教育尚远不逮。然则既受此大战之教训，鉴于各国教育界之革新，宜如何奋勉耶？”他的主张立即引起了进步女青年的响应。在蔡元培的努力下，1920 年春，北京大学先后招收了 9 名女生旁听；秋天，北大正式招收女生，开了我国男女同校的先河。在实行平民教育方面，为使全国人民都能平等地享受教育的权利，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后，首先，他在招生制度上废除由各地衙门推荐选送的办法，采取考试制度，择优录取，坚持以考生学业成绩的优劣作为录取考生的标准。这样，就使得那些出身贫寒而学业优秀的平民子女能有机会进入北大学习。其次，为使更多的有志青年能进入大学学习，蔡元培还主张

开门办学，实行旁听生制度，规定凡有一定程度学历的青年经有关系科教员面试确有听讲能力者，都可入学旁听。这一制度为那些无条件进入大学学习的青年提供了机会。

通过上述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北京大学的风貌，使之焕然一新。不仅把腐败和封建习气极浓的旧北大改造成为一所生机勃勃、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而且开创了一代新风气、新风尚，促进了北京大学的蓬勃发展，对中国近代整个思想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蔡元培在主持北大的 6 年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从此，他无可争议地被奉为全国学界的领袖。

1917 年到 1923 年，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期间，正是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的时代。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蔡元培作为学界领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在《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这样说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与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上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对于新文化运动，蔡元培是有力的支持者和保护者，北京大学因此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本人在反对封建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思想方面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如在提倡白话文方面，他在 1917 年 2 月便与严修、梁启超等人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并担任会长。此后，他多次发表演说，宣传白话文必然取代文言文，他说：“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与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在提倡科学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继续支持我国第一个民间

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活动。1917 年 1 月，他为《科学》杂志撰写《祝科学》一文，阐述科学的重要性，并在经济上给中国科学社以援助。

正因为北京大学进行的改革和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引起了封建势力的恐慌和仇恨，于是对新派势力的攻击和压迫随之而来。蔡元培以其声望和社会地位，排除反对势力的进攻，极力维持北大这一新文化运动阵地。对林琴南的恶语谩骂，蔡元培嗤之以鼻，表示“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对林琴南写给他的公开信，蔡元培从容回信，予以反驳，声明自己决不改变“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于守旧势力压迫他辞退陈独秀，约制胡适，蔡元培坚决予以拒绝，一人承担责任，表示：“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1920 年 4 月，蔡元培还在北京英文《导报》增刊上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以洪水喻新思潮，以猛兽比军阀，热情欢呼被喻作洪水的新文化运动。他说，历史上一个学者攻击别派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象。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他断言，“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和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在激烈的新旧文化斗争中，蔡元培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殿军。

1918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民希望从此一洗国耻，废除一切不平等的

条约。蔡元培也不例外，一改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不涉政界的初衷，特借天安门露天讲台，邀请北大教员于11月15日、16日两天进行对民众的讲演大会，他还亲自作了题为《劳工神圣》和《黑暗与光明的消长》两篇演说。他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是“光明的互助论”战胜“黑暗的强权论”，正义战胜阴谋，平民主义战胜武断主义，大同主义战胜黑暗的种族偏见；他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呼吁人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接着，他又于28日至30日下午在中央公园举行由北大师生参加的演讲大会。但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国人震惊，尤其是青年学生更是情绪激昂。

5月3日，北京大学的学生邀请在京的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代表，参加在本校召开的会议，会上决定第二天举行学生大游行。5月4日，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爆发，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支持的。当他得知学生被捕的消息后，立即进行营救，邀请在京大专院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商议对策，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校长团，为营救学生而奔走。经过蔡元培和校长团的努力，5月7日上午，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并率领全体教职工及学生迎接。5月8日，北京政府决定撤免蔡元培的校长职务，并发出整顿学风和将已经释放学生送交法庭依法审理的命令，并把学生运动加罪于蔡元培。面对反动势力的威胁，蔡元培为营救学生，保护学校，毫不退缩，但鉴于被捕学生已经获释，为避免他个人的进

退导致学生与政府的冲突，影响学校，便于 5 月 9 日晨悄然离京南下。他在南下途中，给北大学生写了一封信，声明他的出走绝无责怪学生之意。他说：“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 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为仆之去职，为有不满意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为挽留蔡元培。”各校学生又于 5 月 19 日实行总罢课。全国纷纷声援，到 6 月初上海举行了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使北京政府不得不将曹汝霖、陆宗、章宗祥三人免职，并电请蔡元培回京主持北大校务。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在国内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终于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使五·四爱国运动的斗争目标得以实现。蔡元培鉴于各方面的敦促，也表示了放弃辞职，9 月由杭州回到北京，继续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回北京大学后，继续奉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一贯主张，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想流派，都采取了维护的态度。 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2 月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针对封建势力攻击污蔑新思想是“洪水猛兽”的陈词滥调，蔡元培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洪水与猛兽》的短文进行驳斥。另外，他继续实行改革新措施，提倡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实行男女同校。尤其是实行男女同校，引起封建军阀的反对。为了避开军阀势力的干涉和压迫，他不得不再次借机出国，于

1920 年 11 月离开北京，他先后到了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和英、美等国的一些大学和学术研究机关参观访问；并到华侨中为北大建造新的图书馆筹集资金。于次年 9 月回到北京。

五·四运动后，北京教育界因反对军阀官僚政客对教育事业的摧残而出现一种教育独立思潮，并形成有一定群众性的教育独立运动，蔡元培全力予以支持，成为这一运动的精神领袖。他还积极支持进步学生开展的非宗教运动，和李大钊一起发起了非宗教同盟。9 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学制会议，他被推选为学制会议主席，在他主持下，会议决定学校系统改革案等重要议案 20 余件。新学制仿效美国“六三三制”，定小学为初高两级，初级为义务教育，四年毕业；高级两年毕业；中学也分为初高两级，各以三年毕业。北京政府以“新学制系统改革令”公布。这个学制一直沿用到全国解放以后。蔡元培因与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伍，采取“不合作政策”，于 1923 年 1 月愤然辞职离京。在他看来，一个政府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有德能的人便应离它而去，这即是不合作，持不合作立场的人多了，政府自然也就消亡了。虽经北京学界的挽留，他名义上仍保留北大校长职务，但主持北大的工作实际已到此结束，于 7 月再次赴欧。随后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不合作宣言》，向世人声明：“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见他们一天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只计利害；不要人格，只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天地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

蔡元培辞职离京后，一度南返上海、绍兴。1923年7月，他再次离沪赴欧，旅居海外。在比利时期间，他应邀前往沙洛王劳工大学作《中国之文艺中兴》的演说，纵论中国和欧洲文明的发展程序，主旨仍是东西文化融合。1926年春，蔡元培从欧洲返回上海，面临着重要的政治抉择，是如约北上，仍担任北京政府的大学校长？还是不合作到底，为南方政府即将开始的北伐做政治上的策应？他毅然选择了后者，投入了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运动。为了反对盘踞在东南的直系军阀孙传芳，他和褚辅成、沈钧儒、许世英、黄炎培等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策动三省的自治运动。此时由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很快占据了江南的大部分地区。1927年3月1日，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在杭州正式成立，蔡元培任委员并代张静江担任主席。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下，于1927年4月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蔡元培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曾一度附和，支持蒋介石的“清党”反共运动。

蔡元培的主要活动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宁汉合流后，蔡无培在南京政府中任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他仿效法国的教育行政制度，提议改教育行政委员会为中华民国大学院，各省也废止教育厅，改为大学区，以国立大学为教育行政机关。他的提议获得南京国民政府的赞同，他被任

命为大学院院长。他提议设立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原意，是使教育学术化，反对官僚化。但新制试行不到一年，非议反对者甚多，加上李石曾为攫取教育行政大权，排挤蔡元培，引起持续不断的学潮；而蒋介石采取袒护李石曾的态度，引起蔡元培的不满，于是他辞去一切职务。大学院也随之撤销，大学区制也终止实行，又恢复教育部，蔡元培的教育理想宣告失败。

蔡元培辞去大学院职务后，虽然不在教育界担任正式职务，但作为一名教育家，他继续致力教育事业，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作了许多工作。1927 年 5 月，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第 90 次会议上，他与李石曾、张静江等人共同提议创设中央研究院，获得通过。1928 年 4 月，中华民国大学院研究院正式改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为了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他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全部精力领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他选聘各学科有杰出才干的学者如杨杏佛、李四光、竺可桢、李济等专家来共同创建。经过他的努力，中央研究院从 1927 年开始筹备，到 1930 年初，共成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等 9 个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博物馆，共有专任、兼任、名誉、特约研究员 91 人，助理员 64 人，编辑 8 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队伍。他坚持专家治院的原则，实行民主管理，发扬不专权、勇于负责的领导作风，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为培养科学人才、发展我国科学事业起了开拓和奠基作用。创设领导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继革新北京大学后对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另一重大贡献。

随着“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蔡元培对蒋介石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极为不满，曾以旧作书赠鲁迅，以表达他对时局的愤懑：“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喑无声。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1932 年 12 月，他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由社会、文化等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一个民间组织。蔡元培根据卢梭天赋人权、人权平等的思想学说，认为人人有民主自由的平等权利，不应当受到任何人的侵犯。宋庆龄任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实质性工作是营救被国民党当局拘捕的政治犯，在其存在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先后营救了许德珩、侯外庐、廖承志、陈赓、丁玲、潘梓年等各方面人士。蔡元培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争取民主，保障人权，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做了大量的工作，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对蔡元培以党国元老和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参与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活动，南京国民党当局极为恼火，不断加以恐吓、威胁。并在南京市党部召开的执委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中央解散同盟，并对蔡元培和宋庆龄提出警告。面对国民党的压制威胁，蔡元培与之进行了积极的抗争。随后，国民党特务不断地向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投寄恐吓信，扬言如不解散同盟停止活动，就要以暗杀手段来对付他们。1933 年 6 月 18 日，国民党特务终于暗杀了杨杏佛，向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示警。此后，同盟的活动难以再继续下去，被迫停止了活动。之后，蔡元培仍以个人身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保障

民权的工作。

1934 年，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和思想专制，在学术界倡导思想自由原则，蔡元培与陶行知、李公朴、陈望道、黄炎培等在上海发起马克思逝世 50 周年纪念会。3 月 14 日，蔡元培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讲座上，主讲了《科学与社会主义概论》。他还专门撰写了《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等文，反对国民党当局掀起的尊孔读经复古逆流。

1936 年 10 月鲁迅逝世，蔡元培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对，和宋庆龄等一起组成治丧委员会，主持丧葬仪式，并在葬礼上发表讲话，赞扬了鲁迅的革命精神和新文学的业绩，公开批评了国民党对鲁迅的迫害。同时，他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上发表《墨子的非攻与善守》一文，借宣传墨子的反侵略精神讽喻国民党的消极抵抗政策。

在此前后，他在写给殿试同年的王玫伯的一封信中，进一步表达了他为实现全民抗战，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愿望。由于蔡元培坚持民主抗日的进步立场，他在当时就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欢迎和赞许。

1936 年 9 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笔致函蔡元培，高度赞扬他的爱国进步立场，并希望他在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实现全民抗日上作出更大的贡献。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蔡元培因病去香港治疗，但仍继续关心中央研究院的工作。1938 年 2 月，他在香港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由于经济窘困，在港期间，他每次生病，都未进行彻底治疗，加上平时对国事的关念，对

日本侵略者的愤慨，致使病情加剧，一病不起。1940年3月5日，这位曾经叱咤五·四中国教育思想界的风云人物，在香港不幸逝世。①

①本文主要参考周天度、韩荣芳的《近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先驱蔡元培》、崔志海的《蔡元培》及张晓唯的《蔡元培评传》等文著，特此说明并致感谢。

# 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

（1916 年 12 月 26 日）

鄙人今日因信教自由会新年俱乐会之机会，得与国会及学界、报界诸君相聚一堂，诚为鄙人之幸。窃闻今日论者往往有请定孔教为国教之议，鄙人对兹问题，深致骇异。据鄙人观察，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国家是国家，各有范围，不能并作一谈。

请言宗教。上古之世，草昧初开，其民智识浅陋，所见惊奇疑异之事，皆以为出于神意。如人之生也从何来，人之死也从何去，万物之生生而代谢也为之者何人，高山之崔巍，大海之汪洋，雨露之恩泽，雷霆之威严，日月之光华，即下至一草一木，一勺水，一撮土，凡不知其理由者，皆以为有神寓乎其间而崇拜之。此多神教所由起也。其后于经验上发明统一之理，则又以为天地间有大主宰焉，虽大至无外，小至微尘，莫不由其意匠之所造。此一神教之所由起也。既有宗教，而天地间一切疑难勿可解决之问题，皆得借教义以解答之。且推之于感情方面，而人类疾病死亡痛苦一切不能满足之心虑，皆得于良心上有所慰藉，与之以新生之希望。又推之于行为方面，而福善祸淫，有人人有天堂之歆羡与地狱之恐怖，以去恶而从善。此皆半开化人所信仰之主义，而无不求其主宰于冥冥之中者也。其后人智日开，科学发达，以星云说明天地之始，以进化论明人类的由来，以引力说原子论明自然界之秩序，而上帝创造世界之说破；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